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融及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李东扬 窦开龙 (通讯作者)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剧烈变动的阶段，也是多族群接触、碰撞与融合的关键时期。本文系统考察了该时期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与内在动因，重点探讨了其在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增强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凝聚力，促进了文化体系的创新与多元发展，为后世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奠定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从文化认同对文化交融的能动的反作用出发，分析了二者在互动中形成的动态建构关系。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化交融；中华文化认同；族群融合

DOI:10.12417/2705-1358.26.03.094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割据与社会动荡的阶段，从公元220年曹魏建立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前后持续369年。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后来西晋在公元280年统一全国，但仅维持20余年便土崩瓦解。西晋灭亡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而北方则经历了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统治。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迁徙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等因素，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内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1]。例如，匈奴贵族刘渊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期间占据并州建立了“汉赵（前赵）”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这些少数民族的内迁不仅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人口结构，也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伴随着政权割据与民族迁徙，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2]，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经济重心南移、士族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兴起、民族经济交流加强等特点。在此背景下，士族阶层崛起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庶族地主和寒门士人也逐渐发展，少数民族贵族逐渐融入汉族社会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一些汉族地主和士族也与少数民族贵族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2 文化交融的表现与动因

2.1 思想文化的交融

儒学的复兴与转型。在魏晋初期，儒学的地位相对较低，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冲击。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重视，儒学逐渐得到复兴。特别是东晋时期，儒学重新确立了其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并出现了转型，更加注重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理论的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玄学的兴起与发展。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儒家的某些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和“自然本体”，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鼎盛。玄学家们通过对《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如“有无之辩”“体用之辨”等，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也为儒道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佛教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佛教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3]。佛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也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的发展与成熟。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道教吸收了儒、佛等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宗教体系，教义和仪式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完善，对后世的宗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李东扬，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窦开龙，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学、旅游管理和经济学。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新疆旅游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研究》（22XMZ047）；新疆大学新疆天池学者领军人才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及新疆实践研究》（510523004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新疆红色旅游效应研究》（610223006）；国家民委2025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疆“三文”史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的案例开发与教学实践研究》；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项目《乌昌地区本科院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24PY0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等思想文化之间发生了广泛的互动与融合。儒学在与佛教和道教的交流中，不断吸收新的思想元素，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佛教和道教也在与儒学的互动中，逐渐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这种思想文化的交融，不仅促进了各种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为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2.2 文学艺术的融合

文学的融合与创新。一是诗歌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安诗歌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开创了新的诗歌风格，其作品如《归园田居》描绘了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二是散文与骈文的兴起。散文在这一时期逐渐骈俪化，形成了讲究辞藻、对偶、用典、声律的骈体文。骈文的发展既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也促进了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和艺术化。三是小说的萌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萌芽，出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学的题材，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艺术的融合与创新。一是绘画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4]。人物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作品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人物的神态和情感。同时，佛教传入也促进了佛教绘画的兴起，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二是书法的创新。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书法作品如《兰亭集序》以其流畅的笔法和高远的意境，开创了行书的新风格。书法艺术的创新不仅提升了书法的艺术价值，也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是音乐与舞蹈的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和舞蹈艺术也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南朝的清商乐与北朝的胡乐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与舞蹈的交融，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更为隋唐时期音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学与艺术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各地的文化特色得以传播和交流，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艺术的融合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使得艺术作品更加生动、多样。三是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在文学艺术的融合过程中，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

2.3 语言文字的统一与传播

语言的统一。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其中包括语言的统一。他下令禁止在朝廷中使用鲜卑语，要求官员和贵族改说汉语，以促进鲜卑与汉族的文化融合。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语言的统一，也加速了鲜卑的汉化进程。在南北朝时期，尽管南北政权分立，但语言的交流并未中断。南北方的移民和商贩往来频繁，使得南北方的语言逐渐融合。例如，东晋时期，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出现了南方吴语与北方汉语的混合。

文字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较为广泛。尽管中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力量有所减弱，但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官方地位一直保持^[5]。这种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加强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字系统。例如，鲜卑在与汉族的长期接触中，逐渐接受了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既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加强了与汉族文化的交流。

语言文字统一与传播的意义。一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语言文字的统一与传播，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障碍，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在共同的语言文字基础上，更容易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认同。二是加强了文化认同感。统一的语言文字为各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载体，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字的统一与传播，为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可以通过统一的语言文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2.4 动因分析

政治因素。一是政权更迭与统一趋势。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都试图实现对更广泛地域的统一和控制。例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促进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这种政治上的统一趋势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和融合。二是民族政策的影响。各政权在治理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6]。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包括迁都洛阳、改说汉语、改穿汉服等，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鲜卑与汉族的文化融合，也推动了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交流。

经济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尽管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受到战乱的破坏，但北人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不同地区的文化能够在经济交流中相互影响和融合。二是商业贸易的促进。随着商业贸易的

发展,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南北互市以及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使得各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元素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带动了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交融。

社会因素。一是民族迁徙与杂居。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北人南迁导致了不同民族的杂居相处,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中逐渐相互学习和借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例如,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业技术,而汉族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畜牧经验和生活方式。二是社会动荡与文化需求。社会动荡不安使得人们对稳定的文化秩序和精神寄托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佛教和道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宗教文化的交融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文化因素。一是文化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展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儒学通过与佛教道教等其他思想文化的交流,不断吸收新的元素丰富自身内容,这种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是文化交流平台与媒介的作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媒介。通过这些交流渠道,中国的文化成果得以传播到域外,同时域外的文化也传入中国,促进了文化的双向交融。

3 文化交融对中华文化认同形成的影响

3.1 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

中华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它是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与集体文化实践过程的统一,涉及“谁的文化认同”“认同什么文化”“认同如何发生”等方面的内容。中华文化认同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客体是中华文化。它不仅包含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同,还涉及对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国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

在古代,中华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文化认同成为团结和激励中华民族共同御敌的重要精神力量,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获得了广泛共识,推动了从“小民族”向“大民族”的转变^[7]。在现代,中华文化认同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而成。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3.2 文化交融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

增强文化自信与凝聚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如南朝的山水诗与北朝的边塞诗相互借鉴,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些文化成就不仅提升了各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积极吸收和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例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鲜卑与汉族的文化融合,使得鲜卑逐渐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促进文化创新与繁荣。儒、佛、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互碰撞与融合,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创新。佛教的因果报应观与儒家的道德修养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玄学思潮的兴起也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促进了文化思想的创新。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在交流中相互借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书法艺术进入成熟阶段,书体多样化,行书、草书逐渐流行。南朝的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北方得到了传播和借鉴,而北方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元素也对南方产生了影响。这种相互借鉴和多元融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推动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繁荣,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慈悲为怀、道教的自然和谐等思想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在社会风俗的交流与融合方面,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对汉族社会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带有浓重胡风的新文化,汉族的文化元素也逐渐被少数民族所接受和吸收。由此,孕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成为各民族认同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化交融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通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得以传承和发扬,这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3 文化认同对文化交融的反作用

引导文化交融的方向与深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认同为文化交融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目标方向。各民族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文化的深入交流与融合。例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正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引导了鲜卑与汉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文化认同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与统一。在这一

时期,尽管存在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但文化认同使得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逐渐形成共识,推动了文化的整合与统一。例如,儒、佛、道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体系。

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文化认同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得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例如,儒家经典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新诠释和广泛传播,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认同也激发了文化的创新动力。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各民族在文化交融中不断吸收新的元素,推动了文化创新与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

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文化认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与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得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价值观念得以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为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文化认同,

使得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从未中断,并在此后得以不断传承与延续。

4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割据与频繁的民族迁徙,在客观上打破了地域与族群的壁垒,推动了文化交融的深入展开。儒、释、道思想在碰撞中相互吸收,文学艺术跨越南北相互影响,语言文字在交流中逐步整合,共同塑造出多元而统一的文化格局。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各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孕育出具有广泛共识的价值观念,也显著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与此同时,日益巩固的文化认同又进一步引导着交融的方向与深度,保障了文化传统在动态发展中延续不辍。

这段历史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特质与自我更新的创造活力。它不仅使中华文明在长期动荡中保持了内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为隋唐大一统格局及其灿烂文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这一历程,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韩绪耀.十六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民族融合.[J].人文杂志,2010(01):154.
- [2] 王秀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南北朝政治经济特点.[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11.
- [3] 冷山.佛像的渊源与当代佛像的塑造.[J].雕塑,2017(03):24.
- [4] 王大勇.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的审美观念.[J].史学月刊,2005(07):123.
- [5] 赵江民,李梅宇,杨紫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与应用.[J].喀什大学学报.2023,44(05):57.
- [6] 蔡有清,王波,罗伟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族际政治治理合法性探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05):87.
- [7] 刘永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与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2):2.